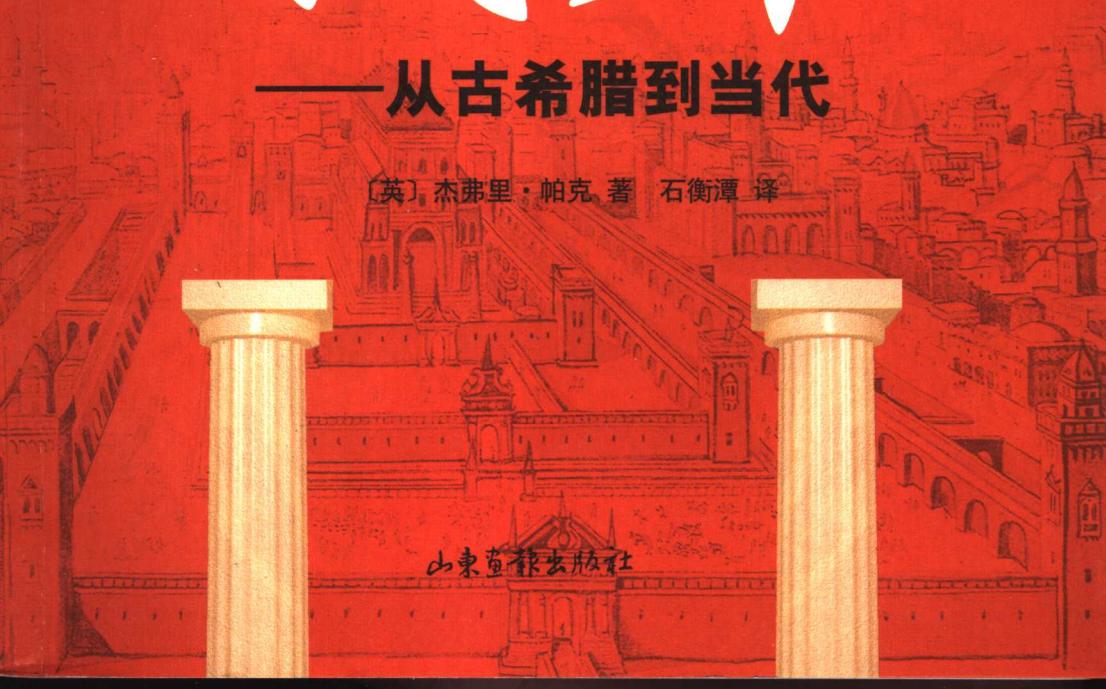




# 城邦

——从古希腊到当代

[英] 杰弗里·帕克 著 石衡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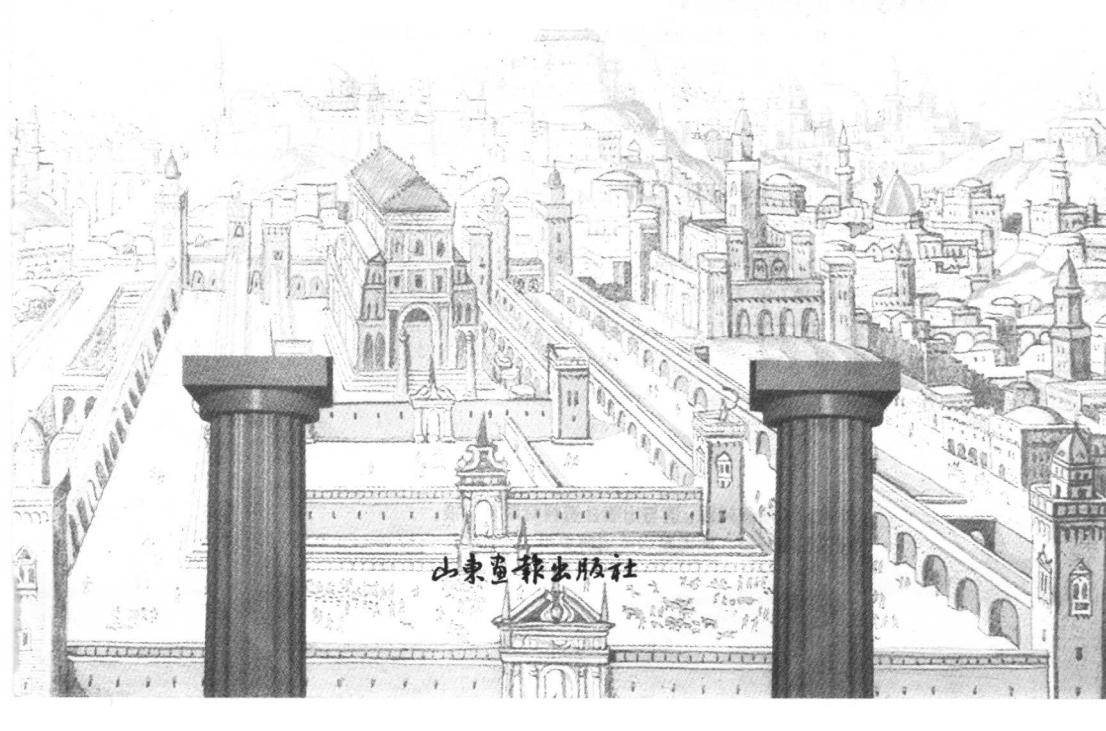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城邦

——从古希腊到当代

〔英〕杰弗里·帕克 著 石衡潭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 / (英) 杰弗里·帕克著; 石衡潭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713-494-7

I. 城… II. ①杰… ②石… III. 城市史—政治地理学：  
地缘地理学—研究—世界 IV. K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165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15-2006-025号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under the  
title *Sovereign City: The City-State Ancient and Modern* by  
Geoffrey Parker, London, 2004  
Copyright © Geoffrey Parker, 2004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5.25 印张 98 幅图 16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地缘政治类或历史类

## 译序

# 小的也是美的

人们常常以大为美，中国人尤其如此，这从汉字“美”的构成就可以看出来，“美”字上面是一个“羊”字，下面是一个“大”字，意思很明显：羊大为美。孟子说：“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荀子说：“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美”；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大为美，以大为好，在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成语中可以信手拈来许多例证，如说成功喜庆：大吉大利，大功告成，大获全胜，大快人心，大喜过望；说人品风仪：大仁大义，大义凛然，大气磅礴，大家闺秀，大家风范；说智慧作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大展鸿图，大有作为，大显身手。而“小”在国人看来则常常与丑陋、猥琐、柔弱等相关，还是拿成语来说吧，同样说行事为人，用“小”来表达则是小打小闹，小手小脚，小题大作，小恩小惠；同样说心胸品格，用“小”则是小黠大痴，小气易盈，小人得志，小肚鸡肠。我们平时引以为骄傲的也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说起历史上疆域广阔的朝代来，我们用汉唐雄风来形容；而提到统治区域相对狭小的王朝，我们就用偏安一隅来表述。2006年，一部系列政论电视片《大国崛起》在全国风行，引来万众瞩目，好评如潮，这也充分折射出了国人的此种心态。这种求大求全之心来得非常急迫与强烈，也在各个方面表现与实施出来。如城市要追求大，一百万的人口不够，要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



万。不少城市放开户口政策，就是要使人口迅速增多，规模迅速扩大。公司要追求大，要打造中国经济的航空母舰，要跻身世界五百强。大学也追求大，近年来，各地大学刮起合并之风，许多数万学生的超大学府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满世界争着为大，忙着做大的时候，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杰弗里·帕克却对“小”特别关注，他要为小正名，为小辩护，他要让人们认识小的美，小的好。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当然，这并不是一本讲美学的书，而是一部地缘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专著，但我以为这并不妨碍人们用美学的眼光来阅读它。读书可以随意，不必一定正襟危坐，也不必一定为应付考试。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则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引申开来，“Ge”就指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则是人的统治与组织。因此，从词源含义来说，“地缘政治学”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率先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它也对德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纳粹所统治的德国时期达到了顶峰，成为其扩张主义的理论武器。这给地缘政治学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使它受到多方的质疑与诟病。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的学者才重新拾起这一术语并力图恢复其本来面目。其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法国学者拉考斯特可谓功不可没，他们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使地缘政治学重新获得学术资格并成为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一般词汇。在当代，地缘政治学主要用来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舞台的各组成部分被视为空间客体，其相互作用构成空间现象。地缘政治学要解释这些空间客体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还要了解整体地缘政治空间在特定时间里发挥作用的过程。地缘政治分析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要对基本空间客体自身特征进行考察；其次要探讨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模式，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区域中相互作用模式差异性的观察；最后要将地缘政治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对

其全部特征予以评价。

在本书中，作者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了四种类型。前三种比较明显的类型是民族国家、帝国或者帝国政府和城邦，而第四种类型则是由这三种类型混合而成的。当今之世，最普遍的国家类型是民族国家，我们对此也非常熟悉，许多国家常常会被当作民族。因此，我们称“阿拉伯国家（nations）”、“非洲国家”、“欧洲国家”。如果时光倒流，让我们回到第二个千年的开端，就会发现，帝国是更通常的地缘政治形式。无数的历史书，也大多是讲述宏伟壮丽帝国的荣辱兴衰，雄才大略君王的命运遭际。而第三种主要国家类型——城邦则是最被人们所忽视的，不过，它也有过自己独领风骚的时光，而且也在不同时代，散发出自己的光芒。而构成这部书主角的恰恰是城邦。作者认为，城邦由这样一些城市组成，它们自认为是国家，它们既完全独立又能够保证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高度自由。在这部书中，作者给我们勾画了城邦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述说了不同时期城邦的面貌与特征，也力图说明它们在不断变化角色中的价值并解释其盛衰更替的原因。作者将城邦的历史追溯到了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非利士人城邦的存在在《圣经》中都有许多的佐证，它们的继承者是推罗、迦太基和其它由腓尼基人建立的海滨贸易城市，当然，最杰出最典范的城邦当数随后出现的希腊城邦，它们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为完美的国家类型。城邦本来是起源于地中海海岸的现象，而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率领的大军的步伐，它由此向东延伸，经过中东和中亚进入了北印度。结果是，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间和印度的沃野平原上都出现了简陋而有限的希腊化城邦身影。随后，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欧洲城邦得到复兴，而在近代，城邦则成为地缘政治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它在沿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的城邦汉萨同盟中达到了顶峰。随着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城邦被带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在后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世界和亚洲地区，城邦也展现了其绰约风姿，如科威特和巴林、新加坡和香港，它



们是帝国强盛时播下的种子，却在帝国衰弱时收获。这也是帝国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作者对这些城邦在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可能发挥的作用作出了预测。

城邦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是规模比较小。对于希腊人来说，小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城邦也像其它东西一样要适合于人的需要。城邦是这样一个单位，在其中既可以容纳他们的文明，同时其结构和功能上的问题也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被他们看作是最基本的。雅典人认为：公民应该能够在普努赫山或最高法院或在集市的空旷地聚集以作出决定。集市，聚集的地方，就是全体公民聚集来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当民主大行其道时，人们希望参与所有的政治事务，那些不这样做的人，那些喜欢私人享乐更甚于公共服务的人被视为白痴。这样的人也总是遭人鄙视。正如雅典伟大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著名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中所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对于希腊城邦公民来说，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苏格拉底也说：“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因此，在两千多年前，民主政制的基本原则就在希腊城邦确立，而后来的城邦也大多采用这一政制并且使之不断完善。

自由是民主的孪生姊妹，民主的政治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自由总是被视为城邦政治生活的基石。只有在古希腊这样自

由的城邦，才可能出现米诺的维纳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形同乞丐的第欧根尼也才敢于不假思索地对主宰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说：“别挡住我的阳光！”自由成为城邦的终极目标与最大魅力。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说得好：“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奴役好一样。”当代著名学者皮朗也指出，公民是自由人的同义词。旧德国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对这一信念的宣称。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是不宽容世界中的“避难所”，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的硬币上都印上“这是为了自由”的字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暴政大墙之外的“避难所”，那些遭受政治与信仰迫害的人们将往何处去，将有何种的未来命运。而正是有了它们，才有了基督新教的发展与扩散，才有了人们重新焕发出各方面创造的活力。

城邦一般都处于海滨或河口等交通枢纽位置，它们本身的自然资源并不十分丰富，许多都不能完全自给，因此，它们通过从事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向外发展。这就使得它们化不利为有利，变贫穷为富裕。希腊城邦以围绕自身的农村地区为依托，形成中心——外围的典型城邦格局。城市是商业与产业的中心，而周边的乡村为它提供农产品和原材料。城郊（chora）通常能够供给城区（asty）大部分的基本需要，富余的产品则用于出口，这就刺激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处于没有希望的沼泽、岛屿和沙丘之中，这里也恰好是西方与东方帝国持续振荡的边界纵轴线的中间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其相对安全，而当帝国争夺的硝烟散尽之后，这里就从争夺的前线变成了连接的纽带。它就凭借这样便利的位置与拜占廷和更远的东方开展贸易，一举而成为亚得里亚海最富庶与最强大的城市。而波罗的海地区城邦更是崛起于冰碛地形之中，这里土地贫瘠，农业产出甚微，许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从远道运来，从而，与周围农村的联系无关紧要，而建立广泛的贸易组织成为必需。这就促成了波罗的海汉萨同盟城市的共同繁荣。基辅与诺夫哥罗德相继崛起则与旧“从瓦兰吉人到希腊人”通道与新“从日尔曼人到



蒙古人”通道的盛衰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地区和亚洲这些地区的城邦也显示出差不多一样的特征：濒临大海，交通便利，贸易在经济中举足轻重，身为跨国经济政治组织的成员，人均财富远远高于领土国家。

面向广阔的世界，与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使得城邦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邦公民的才华与能力常常通过艺术、建筑、科学和哲学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希腊城邦在这些诸多方面都登峰造极，成为后世的光辉典范，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希罗多德、欧几里得……群星璀璨，《伊里亚特》、《奥德赛》、《俄狄浦斯》、《美狄亚》……精彩纷呈。就是继承希腊城邦精神的亚历山大城也成为了文明进步的引领者。在这个城市令人惊叹的建筑缪斯宫内，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意大利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正是文艺复兴的基地与摇篮，乔托、薄伽丘、但丁、彼得拉克、拉斐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大师与巨匠都在这些城市生活与工作过，他们的艺术成为整个城邦事业的一部分并且从城邦的赞助中获益。米开朗基罗受市政府委托而雕塑的大卫像或许是佛罗伦萨最好的象征，另一件受委托制作的艺术品多那太罗的圣乔治则是共和主义的理想化。薄伽丘同样以自己的城市而自豪并且视之为真正的世界中心。达·芬奇的作品则将艺术和科学集于一身，体现了知识与作为万物尺度之人的合一的文艺复兴精神。

城邦的盛衰与特定时期各种国家类型力量的对比相关。有时候，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彼长此消的关系；有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复杂微妙。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城邦属于前一种情形。在古代地中海，希腊城邦在领土势力尚未壮大或者鞭长莫及的时候称雄一时，但其内部的帝国主义倾向却被诱发出来。当其朝着帝国的方向迈进时，却被这一力所不逮的重任拖倒累垮，而让潜滋暗长的陆地势力得渔翁之利。意大利城邦的崛起是在罗马帝国的瓦解之后，而到东方的伊斯兰教王国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持续拉锯之时，却轮到它们坐山观虎斗甚至大发战争财了。它

们的最终衰落也是由于帝国势力的卷土重来。波罗的海汉萨同盟的繁荣则与以往的城邦有所不同。它们的形成得益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帝国的政治与宗教首领本来的意图是要不断地扩大基督教世界的疆域，无数的十字军战士与僧侣也为此热情投入，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自由城邦联盟的产生。这些城邦所享受到的自由甚至比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权威之外的意大利城邦还多。当然，这种特殊的情形仍然与帝国本身的软弱相关。就像布赖斯子爵所说的那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20世纪伊斯兰教地区和亚洲城邦的兴起则与帝国的衰落分不开，但它们又与民族国家的产生联袂而至，这就形成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地缘政治景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的进步，城邦辐射的范围更加广远，它们也不再主要靠地理位置的险要来捍卫和维持其生存，这样，它们更可能获得勃勃生机，并且给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生存的榜样，或者至少，给人类提供另外一种生存模式的可能。

这本书的作者杰弗里·帕克教授是欧洲当代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荣誉资深研究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1933年出生于英国布雷克诺克郡（现在的威尔士），曾经就读于威尔士大学，随后又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深造，在伯明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伯明翰大学退休教授，《地缘政治学》杂志编委。他注重实地考察，曾经游历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欧、东欧和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苏联、蒙古、印度和中国。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欧洲政治地理学和西方与亚洲地理地缘政治学思想。对冷战后世界的政治走向尤感兴趣。主要著作有：《统一的逻辑》（1975）、《欧共体的政治地理学》（1984）、《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1985，1994年中译）、《统治的地缘政治学：从奥斯曼帝国到苏联》（1988）、《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1998，2003年中译）。参与编写的著作有：《政治制度词典》（伦敦，1990）、《地缘政治学词典》（纽约，1994）、《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指南》（伦敦与纽约，1994）、《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伦敦与新德里，1996）、《大都市与政治》（巴黎，1997）、《地理与自由》（巴黎，1999）、



《与民主相对的全球性》(维也纳, 2000)、《全球化: 理论与实践》(伦敦, 1996, 2003年再版)。近年来, 发表的主要文章有: 《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 索尔·B·科亨地缘政治世界观点评价》(《地缘政治学》杂志1999年第2期第13卷)、《拉策尔: 法国学派与可选择地缘政治学的诞生》(《政治地理学》杂志2000年第19期)、《千年转换之际地理与政治的不稳定关系》(《政治地理学》杂志2001年第20期)。近年来, 中国与欧洲政治结构的比较分析也进入他的研究范围。

这本书是英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第一部研究城邦的专著, 可以说开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作者视角之独特、选材之全面、叙述之清晰、评论之精到, 自不待多言, 读者可以自行领略,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自由之钟情和对幸福之关注, 这正是他选择城邦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他的这段话在今天的我们读来仍然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

最重要的不是城邦与其它政治形式相较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现象, 而是其中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始终如一地存在。在其中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其人民的得益而非人民为了国家。城邦从来就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存在, 因为民族国家到20世纪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逐渐地仅仅为自身存在。它没有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让他们忍受穷困并且承受因追求它的伟大荣耀而带来的苦难。

与此相对照的是, 历史上存在过的城邦基本上是非意识形态的。其根本目的是让它的公民生活得更好。詹姆斯·布赖斯在他的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巨著中说, 尽管它们都有缺陷, “然而我们的同情必须在城市一方, 我们公认它的胜利就是自由与文明的胜利”。布赖斯认为城邦本质上的“高贵”是从“雅典共和国高出于奴性的亚洲和残忍的马其顿”时开始的。这个城市在古代是保护人们免受野蛮游牧民族威胁的地方, 而在现代, 它

译 序

成为摆脱周围领土国家暴政和意识形态困扰的自由的中心。

在一个普遍追求高、大、全的时代，他试图告诉人们，其实，你不懂你的心；其实，小的也是美的。

是为译序。

石衡潭

2007年3月2日星期五于北京

# 导语 民族、帝国与城市： 国家的地缘政治学

乍一看世界政治地图，就像是一个由许多不同形状和尺寸板块很随意搭建起来的五彩缤纷的拼图玩具。这些不同的板块表示这些进入政治世界的主权国家是分离的，在拼图玩具上的大尺寸板块表示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而那些细小碎片则表示新加坡和马耳他这样的岛国。开始你可能觉得这些拼图模式并无深意，而实际上它们表示着许多不同类型国家的持续存在，这些国家活跃于不同时代而且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下保持着自己的存在。每一个国家都以独特的方式显示其个性，而它们又可以归结为某种类型。三种最明显的类型是民族国家、帝国或者帝国政府和城邦，而第四种类型可以看出是由这三种类型综合而成的。

当今世界最普遍的国家类型是民族国家，五彩缤纷的世界政治地图也大致表明了这一事实。最普遍的一种地缘政治形式现象，就是国家经常会被当作民族。因此，我们称“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欧洲国家”，与此相同，我们也称“联合国”。不过，若是我们将政治地图往回翻，或许就会发现，在过去，这五彩缤纷的拼板玩具产生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而且曾经存在的主要国家类型与现在也大不相同。如果我们跨越千年而回到第二个千年的开端，就会发现，帝国是更通常的地缘政治形式。如果我们再往回跨越一个千年，我们又会发现，至



少在世界的某些区域，城邦比较普遍。实际上，在大部分时代，每一种地缘政治形式都存在而且不同国家模式常常纷然杂陈。但不管怎样，在任何一个特定时代，在诸多国家之中还是存在标准化的典型。这一标准化典型也试图树立供大多数国家学习的理想模式。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原因，这是一个最被需要的国家形式，大多数国家也力图仿效。成为标准化典型也给予这个国家以一定的合法性，否则它不会被承认。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可见，大部分国家更乐意被称为“民族”(nations)而不是仅仅被称为“国家”(states)，但这常常是愿望多于事实。甚至很难称得上是民族的政治实体也使用这一术语来称呼自己，这意味着它们具有被看作是民族的热望。在特定时刻，一些非独立主权“民族”也期待着羽翼丰满以至于能够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俱乐部的成员。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的情形。出现在这一场景中的新国家主人很快陶醉于自己国家被称为“民族”。此前，它们大部分都没有作为独立主权政治实体而存在过，或者要是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它们历史上的短暂时期。但这一记忆是强烈的，这一热望是有力的，它们也成功地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闪耀于21世纪的政治星空。

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的特殊地缘政治类型确实具有其基本特征，或者它们本身希望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或许采取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形式，或者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出来，而将之以“民族”(nations)这一术语来勉强表述。<sup>①</sup>因为拉丁语中的 *natio* 一词就意味着出生或来源，它也暗示这一国家类型的民族基础。一个民族的人视自身为与其它民族根本不同的存在。法国政治地理学家威德尔·德·拉·布雷克认为“我们”本来就是靠“他人”的存在而定义自己的存在与本性的。<sup>②</sup>

如果说民族成分基于该民族成员的本性，那么国家成分也就基于他们所居住领土的特征。这就造成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混合，它们共同塑造着被当作是祖国特征的独特景观。这样，祖国就成为了民

① M·霍斯曼与A·马夏尔：《追寻民族国家》（伦敦，1994），第3—22页。

② 杰弗里·帕克：《20世纪西方地缘政治思想》（伦敦，1985），第94页。

族的一种自然表达。早期政治地理学家威廉·皮蒂用人体来作比较，心脏就是首府，<sup>①</sup>围绕心脏的就是国家机体，许多重要活动都集中在这里。后来的政治地理学家们将之形象化为中心—外围的结构，重要活动集中在中心区域，而外围则蕴涵和供应多种自然资源，它们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机体更好地存在。工业和农业地区供应着人的需要，而这一切为交通体系连接起来。边境把国家与国家分开，也防范着外来的攻击。<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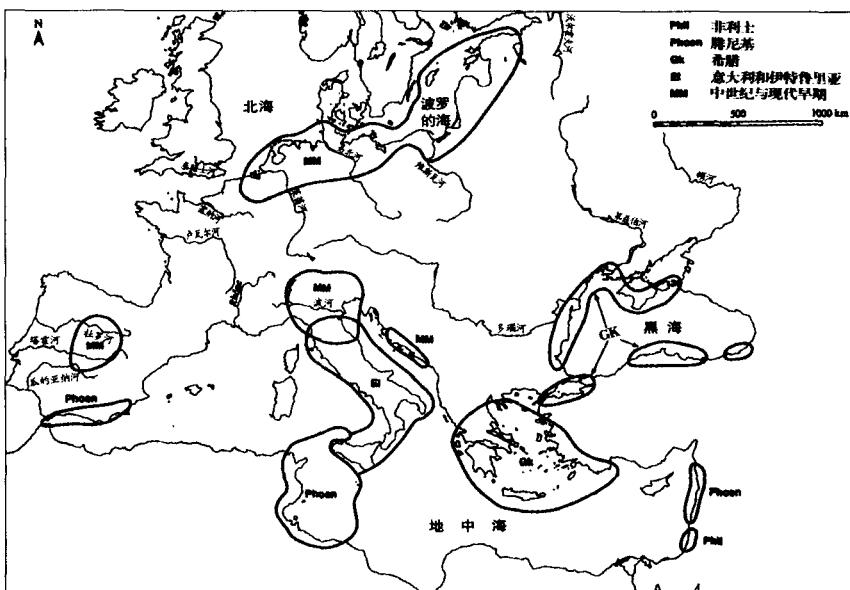
因此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内在结构的自我维持实体的民族国家看起来是比较理想的。它们在空间上互相分离，而与其邻邦的接触被小心地监查与控制着。达到这一理想模式已经成为过去数百年来大部分国家的渴望。甚至当这些国家明显地缺乏某些或许多这些他们一致公认的民族国家特征时，他们仍然迫切希望变得更像那些明显地具有这些特征的国家。这种倾向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相信在20世纪进程中，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要在达尔文主义法则下求生存的自然现象。<sup>③</sup>不过，分析表明，这是一种极明显的人为现象，其根源在于战争和对王朝的渴望，随后国家政府又想将他们自己的一致性强加于先前的多样性存在。譬如，民族语言通常表现出地方方言的多样性，同时它们又往往基于一种特殊方言并以之为核心。实际情形是：民族是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民族可以给国家注入活力，否则国家只是一片毫无生气的领土。这样，民族就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目标——民族主义——过去和今天都能够产生强烈的激情，它还经常伴随着同等程度的对其它民族的敌意。

帝国则是非常不同的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类型。它是由一个特别的民族或人群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所形成的。这种扩张之所以发动，常常是由于统治者想增加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并且试图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鼓励他们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掠夺物。凭借成功的扩张，他们可以统治更多的领土

① Y·M·哥布列特：《政治地理学与世界地图》（伦敦，1956），第19—20页。

② M·格拉斯内：《系统政治地理学》（纽约，1994），第78—93页。

③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伦敦，1998），第32—33页。



欧洲与地中海的城邦群

和与自己大不一样的人民，他们也运用武力来强制推行为维护自己权力所设计的结构。因此，帝国本质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对其他人群的统治，并且这种统治因采取了统治者在领土中心地带所实行的政治结构而得到巩固。这也类似于民族国家的中心－外围的结构方式，只是其规模要大得多。

最著名的并给这一现象命名的帝国是罗马。正好在二千年前，罗马帝国在欧洲和地中海扩张成为这一时间这一地区最大的国家。这一帝国发源于一个城市，它逐渐地往东向亚洲、往北向海上和大陆欧洲扩大其影响。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汉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尔帝国也是极类似的现象。当汉帝国的继承者维持了两千年的统一时，而印度帝国只是时断时续地控制着整个次大陆。俄罗斯帝国传统上自视为罗马的真正继承者，在1917年革命之后这个帝国崩溃并被苏联取代。这个国家自身拥有许多帝国的地缘政治特征，因此不太适合纳入这个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渴望的世界。<sup>①</sup>随着

<sup>①</sup> 杰弗里·帕克：《统治的地缘政治学》（伦敦，1988），第6章。

它在1990年初的瓦解，其成员国获得自由变成了拥有自身权力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具有民族国家的特征，即使是在巨大的规模之下。不过，尽管联邦被称为俄罗斯联邦，但其中还是居住着大量非俄罗斯人，他们中一些人渴望取得完全独立的状态。这一事实显露出，这个联邦仅仅在名义上是民族的，而仍然保持着帝国的外表。

第三种主要国家类型、也是本书最看重的类型是城邦。城邦由这样一些城市组成，它们自认为是国家，它们既完全独立又能够保证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高度自由。尽管过去有过这样的时期——城邦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世界的楷模，而在今天的民族国家时代，只有少数城邦得以存留，它们也不再在任何方面为世界树立任何形式的典范。它们在今天的政治地图上仅仅是些微的残余。这些少数的幸存者留下了他们一度繁荣过的地缘政治迹象。在欧洲，仅仅在几百年前，确实存在过数百个城邦，蒙特卡洛、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圣马力诺仅仅是政治上的奇数，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纯属偶然。它们仍然具有历史的和朝代的存在，并且也与环绕着它们的大国存在着竞争。还有几个国家不是很小，像卢森堡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也拥有自己的独立并与当今的强大权力进行竞争，维持着自己的自由。

与欧洲的情形相对照的是，在世界的其它地区，这种城邦在后帝国时代却经历了略微的复兴。显著的例证就是新加坡和香港，它们在当代东南亚都扮演着意义重大的角色。这两个岛城在城邦状态上也显示了极大的不同。这就是在完全独立主权国家与在大国之中拥有很大自治程度的区分。新加坡现在是完全独立主权国家，而香港在内务方面拥有高度自治。

任何一个特殊城市的政治状态也许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其独立程度也会根据新环境而增加或减少。因此北德国的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诸城市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逐渐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独立，到14世纪，吕贝克都可被视为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当德意志第二帝国进入19世纪后期时，这三个城市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这种在帝国内部的自由城